

当代世界学术名著·经济学系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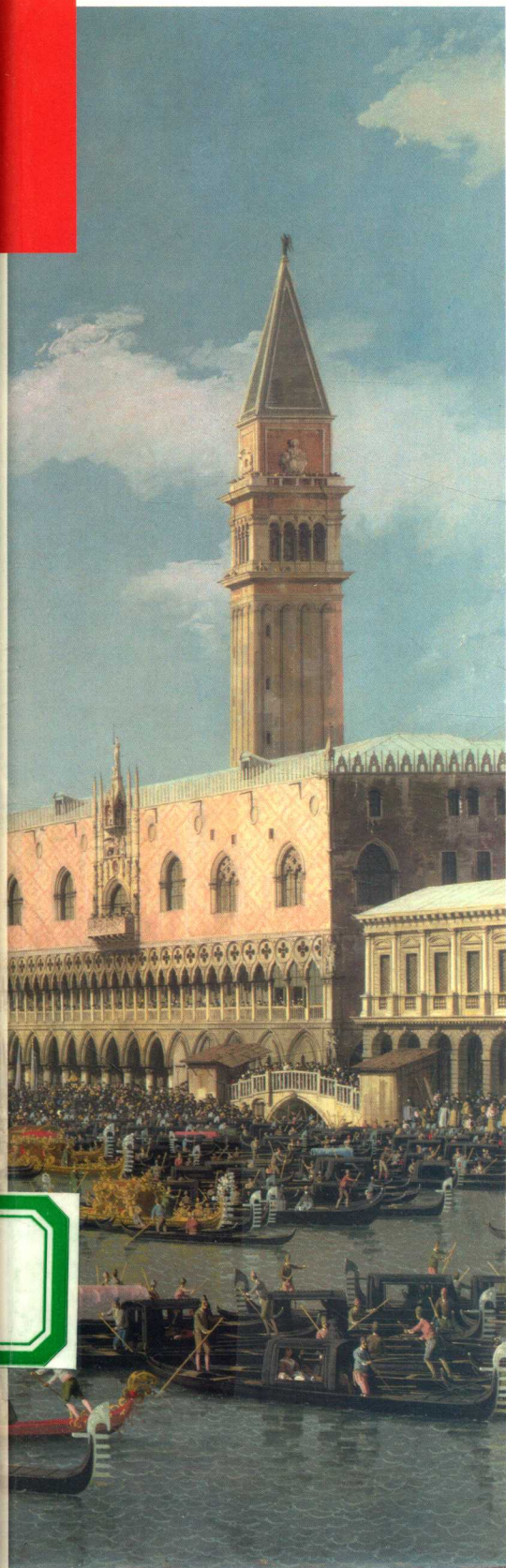
# 增长的文化

## 现代经济的起源

乔尔·莫基尔  
(Joel Mokyr) 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A CULTURE OF GROWTH THE ORIGINS OF THE MODERN ECONOMY



当代世界学术名著·经济学系列

# 增长的文化

## 现代经济的起源

CULTURE OF GROWTH THE ORIGINS OF THE MODERN ECONOMY



乔尔·莫基尔

(J. Mokyr)

著

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北京 ·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增长的文化：现代经济的起源/( ) 乔尔·莫基尔 (Joel Mokyr) 著；胡思捷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0.1

(当代世界学术名著·经济学系列)

书名原文：A Culture of Growth: The Origins of the Modern Economy

ISBN 978-7-300-26291-8

I. ①增… II. ①乔…②胡… III. ①世界经济-现代经济-经济史-研究 IV. ①F119.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224286 号

当代世界学术名著·经济学系列

增长的文化：现代经济的起源

乔尔·莫基尔 著

胡思捷 译

Zengzhang de Wenhua; Xiandai Jingji de Qiyuan

---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邮政编码	100080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电 话	010-62511242 (总编室)	010-62511770 (质管部)	
	010-82501766 (邮购部)	010-62514148 (门市部)	
	010-62515195 (发行公司)	010-62515275 (盗版举报)	
网 址	<a href="http://www.crup.com.cn">http://www.crup.com.cn</a>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涿州市星河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155 mm×235 mm 16 开本	版 次	2020 年 1 月第 1 版
印 张	23.25 插页 3	印 次	202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423 000	定 价	88.00 元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

当代世界学术名著·经济学系列

---

主 编

陈志俊 何 帆 周业安

编委会

陈利平 陈彦斌 陈 钊 陈志俊 丁 利 何 帆 贾毓玲  
柯荣柱 寇宗来 李辉文 李军林 刘元春 陆 铭 王永钦  
王忠玉 夏业良 杨其静 张晓晶 郑江淮 周业安 朱 勇

---

## 策划人语

经济学到了 20 世纪才真正进入一个群星璀璨的时代。在 20 世纪，经济学第一次有了一个相对完整的体系。这个体系包容了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这两个主要的领域。经济学家们在这两个主要的领域不断地深耕密植，使得经济学的分析方法日益精细完美。经济学家们还在微观和宏观这两个主干之上发展出了许多经济学的分支，比如国际经济学、公共财政、劳动经济学等等。体系的确立奠定了经济学的范式，细致的分工带来了专业化的收益。这正是经济学能够以加速度迅猛发展的原因。

走进经济学的神殿，人们不禁生出高山仰止的感慨。年轻的学子顿时会感到，在这个美轮美奂的殿堂里做一名工匠，付出自己一生的辛勤努力，哪怕只是为了完成窗棂上的雕花都是值得的。

然而，新时期已经到来。经济学工匠向窗外望去，发现在更高的山冈上，已经矗立起一座更加富丽堂皇的神殿的脚手架。我们的选择在于：是继续在旧有的经济学殿堂里雕梁画栋，还是到革新的经济学的工地上添砖加瓦。

斯蒂格利茨教授，这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曾经发表过一篇文章，题为《经济学的又一个世纪》。在这篇文章中他谈到，20 世纪的经济学患了“精神分裂症”，即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的脱节，这种脱节既表现为研究方法上的难以沟通，又反映出二者在意识形态上的分歧和对立。21 世纪是经济学分久必合的时代。一方面，宏观经济学正在寻找微观基础；另一方面，微观经济学也正在试图从微观个体的行为推演出总量上的含义。这背后的意识形态的风气转变也值得我们注意。斯蒂格利茨教授曾经讲到，以下两种主张都无法正确估计市场经济的长期活力：一种是凯恩斯式的认为资本主义正在没落的悲观思想；另一种是里根经济学的社会达尔文主义，

表达了对资本主义的盲目乐观。我们已经接近一种处于两者之间的哲学，它将为我们的时代指引方向。

当代经济学从纸上谈兵转变为研究真实世界中的现象。炉火纯青的分析方法和对现实世界的敏锐感觉将成为经济学的核心所在。

“当代世界学术名著·经济学系列”所翻译的这些著作在学术的演进过程中起到的更多是传承的作用，它们是当代经济学的开路先锋。这些著作的作者大多有一个共同的特征。他们不仅是当代最优秀的经济学家，而且是最好的导师。他们善于传授知识，善于开拓新的前沿，更善于指引遥远的旷野中的方向。如果不惮“以偏概全”的指责，我们可以大致举出新时代经济学的若干演进方向：博弈论将几乎全面地改写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将日益动态化；政治经济分析尝试用经济学的逻辑对复杂的政策决策过程有一个清晰的把握；经济学的各个分支将“枝枝相覆盖，叶叶相交通”；平等、道德等伦理学的讨论也将重新进入经济学。

介绍这些著作并不仅仅是为了追踪国外经济学的前沿。追赶者易于蜕变成追随者，盲目的追随易于失去自己的方向。经济学是济世之学，它必将回归于现实。重大现实问题的研究更有可能做出突破性的创新，坚持终极关怀的学者更有可能成长为一代宗师。中国正在全方位地融入世界经济，中国的国内经济发展也到了关键的阶段。我们推出这套丛书，并不是出于赶超的豪言或是追星的时髦。我们的立足点是，经济学的发展正处于一个新的阶段，这个阶段的思想最为活跃，最为开放。这恰恰契合了中国的当前境况。我们借鉴的不仅仅是别人已经成型的理论，我们想要从中体会的正是这种思想的活跃和开放。

这套丛书的出版是一项长期的工作，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南京大学、南开大学、复旦大学、中山大学以及留学海外的许多专家、学者参与了这套译丛的推荐、翻译工作，这套译丛的选题是开放式的，我们真诚地欢迎经济学界的专家、学者在关注这套丛书的同时，能给予它更多的支持，把优秀的经济学学术著作推荐给我们。

献给我的兄弟姐妹  
Rob、Miriam 和 Ada  
感谢他们一直以来对我的支持

解释任何王国商业的兴起和进步，都比解释知识的兴起和进步来得容易。……贪婪，或对财富的欲望，是一种人类普遍的激情，它可以在任何时候、任何地点、任何人身上起作用。不过好奇心，或是对知识的热爱，影响则非常有限，为了使它能够支配每一个人，需要青春、闲暇、教育、天赋、榜样等的共同作用……在追溯技艺与科学的历史时，我们必须比在研究其他学科时更加谨慎，以免我们将技艺与科学的发展归功于一些根本不存在的因素，或是将其偶然性过度简化为稳定且普遍的原则。不论在哪个国家，研究科学的人总占少数。支配他们的激情是有限的；他们对事物的品味和判断足够精妙却又容易扭曲；而即使是很小的事故，都会打断他们的努力。因此，偶然性，或是什么神秘的未知原因，一定对所有高雅技艺的兴起和进步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大卫·休谟，1742年

## 中文版序言

欧洲人一直对中国及其历史深感兴趣。李约瑟于 1942 年抵达中国，在多年的时间里，他最终完成了一部因为“李约瑟之谜”而闻名的巨著并提出：为什么欧洲在 17—18 世纪经历了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而中国却没有？这个问题自提出以来就一直困扰着学者们。彭慕兰的著作必然是李约瑟之后在这个话题上最具影响力的一本书，并提出了“大分流”一词，而它也已成为整个历史现象的一个提喻概念。最近，学者们发现这个术语不太实用。迪尔德丽·麦克洛斯基提出的“大丰富”这一术语在我看来更加恰当，它描述了 1800 年以后收入和生活水平类似于曲棍球曲线变动的时间序列。“分流”是一个关于西方与其他地区相对收入的比较说法，而“丰富”指的是人们所能想到的每一种测量生活水平的指标在全世界范围内的增长。当然，分流所导致的差距正在逐步缩小：1960 年的中国人均收入为当年美国人均收入的 2.98%，1970 年仅为美国人均收入的 2.16%，而现在则增长至 14.14%（根据 2016 年数据，按时价计算）。绝对差距仍然很大，并且随着差距的缩小，亚洲经济体想要完全赶上西方的收入水平也会变得越来越困难。

我们不应该忘记的是，在 21 世纪使整个世界变得更加富裕的技术主要都源自西方。可以肯定的是，在过去的岁月里，尽管有时欧洲人自己可能也会独立地创造出一些新想法，可他们也毫不愧疚地采纳借鉴了其他国家所发明出的不少技术。然而，当他们借来之后，他们会改进、精简这些技术，使它们更能适应新的环境。最终，世界其他地方又不得不从欧洲重新进口新的思想，而这一过程 and 变化经常是不可察觉的——19 世纪后期印度进口的曼彻斯特制造的棉纺纱机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印度和中国在过去三十年中的经济增长，以及在此之前，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的发展，都是

相当惊人的，但它们都主要依赖于首先于西方发展出的工业技术。

关于为什么“大丰富”发生于彼时彼地的答案有许多，而这个问题可能是由多种因素决定的：我们给出的答案太多，而不是太少。我在这本书中给出的答案其实在 18 世纪中叶就已可察端倪了。在一段有趣（被广泛引用）的章节中，塞缪尔·约翰逊博士虚构出的阿比西尼亚王子拉塞勒斯（Rasselas）询问他的哲学家朋友，“欧洲人采取了何种手段才变得如此强大？或者为什么他们能够如此轻易地征服亚洲和非洲，从事海外贸易活动，而亚洲人和非洲人却不能占领欧洲人的海岸，在他们的港口建立殖民地……何况将欧洲人带去亚洲和非洲的海风明明也可以带领我们抵达欧洲。”书中给出的答案大概会吓倒今天那些政治正确的资本主义历史学家：“先生，他们比我们更强大，是因为他们更聪明；有识之士必然会主宰无知之人。但为什么他们所知比我们更多，我不知道。”不过，这个问题并非无法回答的。到 1750 年，欧洲人对可以影响或将会影响经济表现，从而影响国民生活水平和国家军事能力的科目肯定比非欧洲人了解得更多。在一个世纪以后，这些知识被转化为了一个帝国主义全盘计划，在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镇压印度民族起义，以及后来欧洲各国征服非洲和东南亚之时达到了顶峰。如果我们说，在埃里克·琼斯提出的“欧洲奇迹”的背后，起决定性作用的是伽利略、牛顿、拉瓦锡，以及亚伯拉罕·达比、詹姆斯·瓦特和亨利·贝塞麦的思想革命，这并不夸张。

但是约翰逊博士的解释，正如他所承认的那样，是不充分的。问题不在于欧洲的知识比中国或印度或中东地区更“多”，而是欧洲人掌握的是不同的知识。1500 年以后欧洲受过良好教育的精英们越来越关心他们所学知识的有用应用，并制订了一个扩大知识的研究计划，明确了将知识应用于实践中的实际目的。伟大的英国科学家罗伯特·波义耳，他作为科学界的巨匠之一，曾经写道：“我不敢认为自己是一个真正的自然主义者，除非相比于那些不懂得生理学（自然哲学）的人来说，我可以在我的花园里种出更好的草药和鲜花，在我的果园中种出更好的水果，在我的田地上种出更好的玉米，或者在我的牧场里产出更好的奶酪。”

为什么会这样？正如我在本书中指出的那样，文明社会在科学和技术进步方面并不一定表现突出。科技的进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智力活动所发生于的文化和制度环境。制度制定了能够推动知识创新者的激励因素，也决定了创新发展的方向。文化确定了这些制度背后的价值观和信念，但是同时，很多（比许多历史学家所认为的多得多）进步的出现都纯属偶然。以欧洲的犹太文化为例，犹太人识字率高，智力活动也非常先进且复杂，他们的文化程度可以说（平均来说）比他们周围的非犹太人口要高。可是犹太文化，直到 1800 年左右，仍是回瞻性的，主要固守于古代著作和法典

的研究和解释之中，对自然哲学、数学或医学几乎没什么兴趣。一句来自犹太圣人\*的名言是：“如果我们的前辈是天使，那我们只是凡人；如果我们的前辈是凡人，那我们就只能称得上一群驴子了。”尽管中国人与欧洲犹太人之间存在巨大差异，但元朝后的中国文化慢慢变得与这样的犹太文化很相似。中国最重要的制度不存在于犹太教会堂或是塔木德学院，而存在于中央行政部门和为加入其中寒窗苦读的需求。人力资本在中国并没有失踪，只是中国对人力资本的培训完全只针对于对新儒家学派“四书”（《四书集注》）的考察。在欧洲，对存在于宗教和世俗的古典书籍中的科学知识的盲目崇拜在16世纪就开始渐渐消失了。到了牛顿的时代，在科学上活跃的人中就已经基本不存在这种崇拜了。

从哥伦布到艾萨克·牛顿去世前的时期，发生于欧洲社会中的巨大变化中最关键的就是其“思想市场”的转型。与中国不同，欧洲并不存在一个单一的买家规定了此市场的所有参数。在欧洲，思想市场极具竞争力，而就像经济学家所知道的那样，竞争性市场产生的结果与垄断性市场的结果是截然不同的。不过，竞争性市场只有在为竞争程序制定了规则的制度的支持下才能奏效。使这一市场得以运转，并驱使了欧洲知识分子的文化态度和态度变革的是一个欧洲社会下潜在的制度，它确定了绝大多数参与者都接受的学术游戏规则——“文人共和国”——一个非政府的跨国网络，知识分子在其中传播知识，评判他人学术作品的质量，也获得他人对自己学术作品的评价。通过这一制度他们能获得的奖励包括在学术界的名誉（虽然这并不能为他们带来多少财富）、社会认同和地位、保护，以及资助者为他们提供的职位。因为许多强大且富裕的顾客经常会期待从学者研究中获得一些实际的好处，所以自然哲学家们也要努力使他们的知识变得实用。

至今为止还没有严肃的学者认为，与此同时亚洲或中东所发生的一切应该被视作“失败”（虽然过去有一些中国学者确实是这样认为的）。在工业革命之前，无论世界上的哪个角落，技术进步的发展一直很缓慢，从长远来看，它们也都无法真正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在这个意义上，1800年前后发生的事件可以看作一种“相变”——经济动态下的限定因素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里要强调的重点是，欧洲在这方面的成就不是任何欧洲文化“优越性”的结果，也不是其资源禀赋、地理位置、一神论或希腊罗马古典遗产（大部分想象出来的）的优势或更好的市场所带来的结果。身处历史舞台中心的是人，以及人们所相信、重视和担心的，是这些驱使了创新方法的产生。欧洲与“其他地区”之间在1700年之后出现的差距的源头其实相当微不足道，可是这些微小的差异最终导致两个文明走上了不

---

\* Chazal, 此词为犹太教早期圣人姓名首字母的缩略词。——译者注

同的道路，欧洲知识分子选择的研究议程最终让他们能够更好地理解物理、数学、化学和生物学，而这些都是工业革命中的机械和其他设备得以出现和发展的根本基础。

即使我们认为中国的命运本是可以扭转的，这也并非荒唐。宋朝时中国本能够大力发展煤炭、钢铁和棉花产业，创造出最为先进的技术和产品，也就是说，中国在当时就本可以产生工业革命。此外，我们也可以认为，如果欧洲在 16 世纪是一个处于宗教不宽容和高压政治之下的保守和愚昧的社会的话，伽利略和牛顿必然会被认定为异端分子而被处死，智力创新也将被扼杀在摇篮里了。

亚洲的历史表明，制度变迁对后续的技术和经济发展有多么重要。日本、中国、韩国、印度和土耳其各自都以不同的方式和时机完成了深刻的体制改革，才跟上了现代经济增长的大潮。日本 1868 年的明治维新是亚洲国家中的第一个，在某些方面也是最成功的革命；在中国，人们尝试了不止一种制度设计，直到邓小平时期，中国才找到了那条最合适的道路。制度变革本身还不够；朝鲜与韩国的对比表明，有些制度形式并不像其他形式那样有效。此外，经济增长能够出现于不止一种（甚至是全部）政治体制之中。只关注于一个国家内部的体制是具有误导性的：多国和跨国制度可能同样重要。

我们还没有一套统一的理论来解释制度是如何变迁的，以及为什么它们是如此变迁的。通常，这些都是历史偶然性的结果，而不是深层且必然会产生的经济和文化力量所造就的。当然，文化和制度之间存在联系，但关联甚微。例如，人们可能会认为如果一个社会的盛行文化是相信市场可以更好地分配资源，那么这个社会将由自由企业所主导，但实际上，这种信仰在 1989 年到 1991 年期间，在东欧一夜之间就被推翻。历史是重要的：国家现状和偶然事件可能会阻碍社会正常发展，制度也可能产生突然的剧烈改变，例如在法国大革命和俄国革命中发生的那样。制度上的结果可能会以某种方式反映出大多数人所相信和重视的内容。反过来说，这些信仰和价值观可能又是因为制度所产生的——大多数学者认为它们是共同演变的。然而，文化自身也会改变，本书的部分内容解释了其改变的原因和方式：首先知识创新者提出思想和文化变体，其次受众根据证据、逻辑和其他标准来评判它们的价值。不论好坏，思想市场就是如此运作的。我也希望本书中提出的想法可以以同样的方式被大家评判。

于伊利诺伊州埃文斯顿

2017 年 8 月

## 序 言

经济史和思想史是充满生机和活力的两大学科，可是遗憾的是，关于两者的交叉研究却很少。唯物主义者通过为经济结构的霸权辩护来解释人们已知和所相信事物的变化，而除了他们粗糙的解释之外，并没有什么研究显示出了世界上多数经济体在过去三个世纪发生的多数变化都是出于人们的信念。特别是，现代经济增长或者是“大丰富”（the Great Enrichment）的产生，其实是依赖于一系列信仰、价值观以及偏好上的彻底改变——也就是我会称之为的“文化”改变，即使有很多人已经对“文化”一词的过度使用以及它的不准确性表达过合理的担忧。

然而，是哪些信仰发生了变化？又是谁的信仰发生了变化？在早先的研究中，我已经论证过欧洲的启蒙运动（或者至少其中的一大部分）对19世纪经济增长的推动起到了关键作用。除了极少数认为启蒙运动是一个倒退进程的人，或是那些将20世纪的某些灾难归咎于启蒙运动的人之外，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这似乎是个显而易见到乏味的观点。但事实上，启蒙运动并非一个大规模的运动。它是一个出现在精英阶层的小范围现象，其影响力极大限制在了知识分子、学者、有文化且受过教育的少数人之中，这不光包括了医生或是哲学家，也包括了那些实用型人才，像是工程师、实业家、仪器制造师等，不过他们仍只占到总人口中很小的一部分。新科学见解的产生、新技术的发明，以及它们在生产中的成功应用——这些成就都只是由总人口中那一小部分人来实现和完成的。我也认为，重要的不仅是人们对社会契约、政治多元化、宗教宽容、人权等问题的看法，重要的也包括人们对人与现实环境的关系，以及“有用知识”在现实生活中提高生活质量的应用等这一类问题的看法。事实上，是人们最基本的信念导致了文化上的突破，文化上的突破又使得后来的一切得以发生。这一最基本

的信念就是，通过理解自然现象及规律，并将这一理解应用到生产领域，人类是可以获得持续的进步的。

但这些信念究竟是如何产生，以及为何产生的？从哥伦布到牛顿的这两个世纪中，欧洲的精英文化经历了彻底的思想变革。在这本书中，我将使用思想史及科学技术史中的实例来分析这一变革，并试图解释一个经济学家们总会反复提出的问题：“我们究竟应该怎样解释‘现代经济’这一概念？”本书中使用的方法论来源于社会科学——主要是来源于经济学，但也有来自文化进化理论的方法。本书试图分析的是关于思想创新中最为深层的问题。究竟为什么人们总会产生一些新想法？这些新想法又是如何成功取代旧观念的？为什么是这一种新观点而不是另一种？通过提出这些问题，我将展示“早期现代”欧洲是如何为18世纪的大量变革打下基础的：也就是经济史中的三大引擎——启蒙运动、工业革命和有用知识的兴起。

## 致 谢

这本书最初的原型是我于 2010 年 11 月在格拉茨大学约瑟夫·熊彼特讲座中的授课内容。我极为感谢邀请我参与讲座的熊彼特学会的主办者们，感谢他们的热情，以及他们对讲座提出的深刻见解。一般来说，根据讲座所完成的专著篇幅相对都较短。不过这本书不仅是当时讲座的文字版，它更是一本具有独立生命的著作，其中加入了很多新的章节。我在之前的研究中都提到，工业革命后的欧洲历史的标志就是经济和技术奇迹，而像启蒙运动这样的文化现象的出现则是奇迹出现的关键。这一关键则明确了我们接下来该探索的更深层的问题，有关知识创新的起源和出现，以及完成这次重大突破的极具创造性的学者与工程师们的问题。现代经济学已经接受了这一挑战——尝试理解不在其研究范围之内长达半个世纪之久的两大要素：文化与制度。在这本书中，我研究了从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到牛顿出版《数学原理》一书这段时期间的欧洲文化与制度，并提出了现代经济增长出现的条件是如何产生及为什么会产生的疑问。

像这样的大部头书籍从来不可能凭一己之力完成。许多不研究知识分子和文化历史的同事和朋友都耐心地倾听了我关于这两个问题断断续续的胡言乱语。他们的问题和疑惑使我更下定了决心要深入地探索这一话题，虽然在这本书中，我肯定没能回答出他们提出的所有问题。在我的同路人中，我应该提到三个学者，他们的研究和与我的友谊是我的灵感源泉，即使他们的背景都各不相同：社会学家杰克·戈德斯通、历史学家玛格丽特·雅各布以及一位无人能与之相媲美的经济学家，历史学家和通才迪尔德丽·麦克洛斯基。

在西北大学，我已经享受了多年身处两个充满活力而又大不相同的系列的好处——经济学系和历史学系。虽然人们总对经济学家有点成见，但

他们通常都是非常见地且博学多才的知识分子。他们中许多人也是我终生忠诚的朋友，其中，经济史学家当然是最重要的：我的朋友和经济史学家同事们——路易斯·凯恩、约瑟夫·费里、马拉·斯基奇卡里尼和雷吉纳·格雷夫（现在在欧洲大学）。在其他经济学家中，我应该特别提及拉里·克里斯蒂亚诺、埃迪·德克尔、马赛厄斯·多克、马丁·艾切博姆、罗伯特·J. 戈登、乔尔·霍洛维茨、琳内·基泽林和查尔斯·曼斯基。在历史学系，曾经帮助我进行这本书的写作的同事有肯尼斯·阿德尔、莉迪亚·巴尼特、彼得·卡罗尔、萨拉·马萨、梅利莎·麦考利、爱德华·穆尔和尤哈南·彼得罗夫斯基。与拉比·阿基瓦非常相似，在我整个职业生涯中，我从我的学生们身上学到得最多，他们是：兰·艾布拉米茨基、盖尔戈·拜克斯、玛丽斯特拉·柏特琴、乔斯·埃斯皮、阿维纳·格雷夫、罗尔夫·梅森萨赫勒、约翰·奈、孙端辉、扬奈·斯皮策、里克·索斯塔、克里斯·维克斯、马洛斯·范瓦詹博格、玛丽安·亨德斯·瓦纳马克、安东尼·弗雷、卢多维科·萨拉加、尼古拉斯·齐巴斯和阿里尔·齐曼。

在西北大学之外，加拿大高级研究所（Canadian Institute for Advanced Research, CIFAR）下的一个非常美妙的“制度、组织和增长小组”也许有任何学者可以想象得到的学术氛围最好的环境。这个小组包括了社会科学领域在这个世界上最优秀的学者们，其对经济史的兴趣也是无与伦比的。这个小组帮助我联系到了很多优秀学者，并从他们身上学到了很多。这些学者包括达龙·阿西莫格鲁、罗兰·贝纳布、蒂姆·贝斯利、罗伯·博伊德、毛里西奥·德雷利克曼、阿弗纳·格雷夫、埃尔哈纳·赫尔普曼·约瑟夫·亨里奇、罗杰·迈尔森、托斯滕·佩尔森、詹姆斯·罗宾逊、肯·谢普瑟和圭多·塔贝利尼。每一个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项目都会从这个杰出群体的意见和建议中受益良多。四十年来，我从我的爱尔兰朋友和合著者科马克·奥·格拉达无穷无尽的智慧、学问和善良中学到了太多。他和我们另一位好伙伴摩根·凯利（现在在都柏林大学），对这份手稿提出了太多有价值的贡献和建议。我还要感谢林琴科学院院长阿尔贝托·奎德里奥·克奇奥教授的鼓励和劝诫。在以色列，我受益于两个部门：特拉维夫大学的贝格拉斯经济学院以及在兹维·埃克斯坦领导下的赫尔兹利亚跨学科中心。我要特别感谢的其他来自以色列的朋友，包括我的合作者和亲爱的朋友阿米拉·奥费尔和卡琳·范德比克，我的终身同路者、开放大学的校长雅各布·梅泽尔以及周到和聪明的曼努埃尔·特拉滕贝格，他此前在特拉维夫大学工作。在这些机构之外，我尤其要感谢四位经济史界的泰斗：埃里克·琼斯、已故的戴维·兰德斯、已故的道格拉斯·诺斯和已故的内森·罗森伯格。虽然已经过去很久，但我从来没有忘记的，是我对我已故的西北大学同事乔纳森·R. 休斯和他的妻子玛丽·格雷的回忆。

## 致 谢

除了这些人之外，还有许多参加了研讨会和讲座的其他学者都帮助我提炼出了各种想法和观点，最终完成了这本书。其中包括以下机构的经济史和经济学研讨会：巴依兰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本·古里安大学、剑桥大学、卡尔顿学院、哈佛大学、希伯来大学、赫尔兹利亚跨学科中心、麻省理工大学斯隆商学院、普林斯顿高级研究中心、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北京大学、特拉维夫大学和耶鲁大学。

我和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的长期合作关系使这本书的出版变得特别愉快。与彼得·多尔蒂和塞斯·迪奇克合作这个项目以及许多其他项目，一直是一种享受。我的手稿由锡德·威斯特摩兰和玛丽·比尔登精细和耐心地编辑，并由能力极强的马克·贝利斯完成制作。我对各位以及这一切心怀感激。同时，我也十分感谢为我提供资金支持的西北大学温伯格艺术与科学学院、西北大学经济史中心、Valor Equity（一家芝加哥私募股权公司），特别是安东尼奥·格拉西亚斯和克里斯·墨菲、查塔姆资产管理公司的安东尼·梅尔彻雷尔和巴尔赞国际基金会。

最后，和往常一样，任何语言都无力表达我对我妻子玛格丽特·莫基尔的感谢，她的耐心和忠诚只能与她的聪明才智、她的能力和她的决断力相配。

于伊利诺伊州斯科基

2016年3月